【名家背影】

怀念吕荧先生(下)

□吕家乡

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声讨胡风前,吕荧的一篇评论曹禺剧本《明朗的天》的文章刚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一定是怀着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自信去参加争论的。他被轰下来之后,也没觉得多么严重,大不了像几年前在山大那样吧,因此散会后他就去拜访胡风的夫人。他肯定想不到会被“隔离审查”。

隔离审查为时一年,1956年6月解除,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论文《美是什么》,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公开宣布为他恢复名誉。当然,他这次又可以说“我是对的,你们错了”,不过这时他的心情已大大不同于山大风波之后了。公安部主持的一年“隔离审查”使他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身体和精神都大受摧残。我听韩长经同学(在山大中文系比我高一个年级,毕业后留校任教)说,他到北京多次见到吕荧,吕荧患了精神分裂症,时轻时重。吕荧煞有介事地说:公安部进口了一种最新仪器,能够测知人的脑子里想什么。我虽然放出来了,公安部仍然每天朝我发射电波,探测我的思想。电波有强有弱,每次发电波我都有感觉。一次一块吃饭时,他突然大叫:头疼!电波来了,很强很强的一种!

他仍然坚持研究和翻译,1957年、1958年、1959年每年都有论著或译著出版,1962年还发表了美学论文《关于“美”与“好”》。他始终坚持“美是主观的”,和主流看法抗衡。

1964年春,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济南市一所中学教书,忽然接到他的一封挂号信,是用毛笔写的,信封的下端醒目地写着“北京吕荧”四个杏子般大小的字。我拆开信封,里边有一本我听他讲《文艺学》的课堂笔记,他当年要了去,一是要为我订正,二是要作为参考,准备把讲稿加以整理,正式出版。这计划已成泡影了。他信中的“您的笔记奉还”几个字,该有多少画外音!信中还说他这些年“乏善足陈”,估计我“在思想和学业上定有长进”……他只字未提我们那次不愉快的分别,却留了详细的地址,希望我给他去信。我沉思良久,他一定是从韩长经等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情况,他为什么不避嫌疑地给我这个摘帽右派来信呢?我隐隐地感到一丝温暖。我给他写了回信,付邮之前,一位好心的同事建议:现在在搞“社教”运动,吕荧属于敏感人物,回信还是要给校领导汇报一下。结果,回信没有寄出,吕荧的来信和我的那本笔记也交给了校领导,从此再也没有收回。

> 临终前他拄着一根树枝,围着一棵开着白花的野生的茨菰,转了一圈又一圈,痴痴地嗫嚅着:“真美呀!真美呀!”

改革开放后,我获得新生,打听到了师妹潘怡、潘悦的地址。她们在困境中顽强拼搏,都成了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才,这和爸爸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从她们那里,我了解到吕荧先生晚年的悲剧。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他就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和“持刀威胁革命群众”为由逮捕,起因是为了生活琐事和邻人争吵,当时他正削着苹果,不由得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这让我想起当年“刀砍保姆”的传说,这次可没有那次幸运,竟被押赴清河农场强制劳动。临走仍旧不忘带上他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几根夜间写字用的蜡烛,夹层还藏着未写完的美学著作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草稿。他像梦中人一样,仍以为可继续文字生涯。他在农场被折磨得疾病加重,带病出工,食不果腹,更谈不到医疗,最后体重不过五十斤。临终前他拄着一根树枝,围着一棵开着白花的野生的茨菰,转了一圈又一圈,痴痴地嗫嚅着:“真美呀!真美呀!”1969年3月5日吕荧含冤而去,年仅54岁。一同劳动改造的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姜葆琛对他多有照顾,为他送了终,后来写文留下了他最后的剪影。1979年5月31日,公安部决定“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吕荧先生
▶吕荧先生著作

每次想到吕荧先生,我都思绪万千,又觉得说不出话。现在我已年过八旬,享受到了吕荧未曾享受的宽松,却无端地在脑中盘旋着吕荧的质问:“维护真理能含糊吗?”我该怎样向吕荧学习呢?“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我面对“皇帝的新衣”,能不能像吕荧那样无所顾忌地实话实说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岁月留痕】

我与杨象宪先生的“画情”

□曹务堂

象宪兄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使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受益良多。

2011年3月18日,杨象宪先生走了,而且走得那么突然。惊闻噩耗,我难以置信,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他要争取活到90岁。当时我就对他说,“你一定能超过90,因为画家都长寿。”他听后笑而致谢。

30多年来,我和杨先生从不相识到相识,从朋友到至交,这一切均缘于国画。

1981年他从浙江调来曲师美术系任教。当我听说他是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高足时,心中十分仰慕。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国画,特别爱看画报上刊登的国画,并对我国当代国画大师的名字如数家珍。因为仰慕他的大名,我萌发了向他求画的念头,于是我便托美术系的一位同事向他求画。其实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更不知道他是否能满足我的贸然请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个礼拜之后,同事便给我送来了一幅他的花鸟画。我如获至宝,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得到的第一幅名人国画。之后我马上托朋友到山东美术馆装裱,至今这幅画仍挂在寒舍。

我与杨象宪先生真正相识并互有了解是始于1985年。那年,曲阜旅行社为美国游客开发了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孔子修学团”。旅行社邀请我校的几位教授为游客讲课,杨先生讲国画,我讲“中国传统节日及民俗”,还有讲孔子思想和书法的。中午旅行社招待我们吃饭,我与他并肩而坐,亲切交谈。一次短暂的接触和交谈,使我感到他是一位为人随和、胸怀坦荡的学者,顿生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我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很谈得来,双方均觉得对方是可交往之人,感情日渐加深,遂成至交。杨先生大我几岁,视我为老弟,我视他为兄长。

1989年母校嘉祥二中举办40周年校庆,邀请我参加。当时我想,送什么东西给母校最有意义呢?后来我感到送一幅画比较好,既高雅又有意义。于是我专门拜访杨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他说明来意,因为当时我不知他是否能答应我的请求。出乎我意料的是,象宪兄听了我的来意之后,立刻铺开宣纸,当场欣然泼墨,画了一幅“桃李图”,寓意母校“桃李满天下”。在我看来实乃佳作,不想他对着作品端详了一番,然后将画拿起,正当我要接画致谢时,他却两手把画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我非常不解和惊愕,便问道:“杨老师,你怎么把这么好的画扔了呢?”他只说了两个字:“不行。”当时我理解他是依他画家独有的艺术眼光审视作品,觉得不满意遂而弃之。随后,他又画了一幅,端详一番,觉得满意,这才题上字,盖上印章,用报纸包好送给了我。象宪兄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使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受益良多。

1990年的一天,我去他家闲坐。兄弟二人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倾心交谈,十分愉悦,当时他满面春风,兴致盎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不一会儿他拿出一张宣纸,很快给我画了一幅兰花,题上字,盖上印章。此画雅致而素朴,题字遒劲而飘逸,二者相得益彰,我非常喜欢。我想,象宪兄就犹如那兰花,卓尔不群的高雅风范跃然纸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挂在卧室里。

2004年的一天,他打电话要我去他家,但没说何故。放下电话我便应约前往。到了他家之后,象宪兄把我领进画室,只见墙上挂满了装裱好的新作。他对我说:“你可以随便选一幅。”我当时受宠若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能受到如此待遇者怕是寥若晨星。于是我便毫不客气地选了一幅“荷叶、水鸟”。画面是两片荷叶和一只水鸟,构图简洁而明快,画风清新而雅致。回家后我便立刻把它挂在客厅内。一年之后,我忍痛割爱把它送给了我在美国的小儿子。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中国文化。

1992年7月,象宪兄被聘为美国Skidmore学院客座教授,讲学一年,教授中国花鸟画和书法。他的工作受到了学院领导和师生的一致好评。该院美术系主任Doretta Miller教授这样写道:“院长David Porter视杨教授为学校最受尊重的教师之一,认为他是一位既和善大方又具有非凡天才的艺术家。他受到学生和同事的一致爱戴,他组织的学生书画展好评如潮。在杨教授的启迪下,许多学生都把中国书画作为终生的艺术追求。”该院终身教授Murray Levith博士对杨教授有这样的评价:“他既慈祥和善又乐于助人,他是一位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一位启迪心智的教师,我们对他敬慕之至。”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他山之石】

两位美国学者怎样思考学术问题

□赵勇

北师大文学院专门为师范生编写了一套教材,我主编的《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其中之一。教材编写启动于2009年年底,当时我与几位博士生反复讨论过编写大纲,甚至还把北师大二附中著名的语文教师何杰先生请过来出谋划策。然而教材启动后我却忙别的去了,以至于我要写的两章内容迟迟没能动手。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把它们写出来了,但开写之后没想到却颇不顺畅。我负责的是具有总论性质的一章内容《文学与大众文化》,另一章是《文学经典:建构、解构与重构》。为了把它们写出点意思,我自然是翻阅了一堆书,而其中新读且对我启发较大的是两位美国学者的书:约翰·杰洛瑞的《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莱斯利·菲德勒的《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毫无疑问,杰洛瑞是通过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来展开他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相关思考的。而一旦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打量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原来简单的事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例如,学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新批评发明了一整套解读文学的方法,什么“文本细读”、“诗歌张力”、“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等等。这固然不错,但也很容易忽略新批评在建构文学经典时的权力运作过程。为了在现代大学中增加文学课程的文化资本,新批评家们便把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人诗作请进来,奉为经典;又把不合他们口味的作品赶出去,让它们沦落为街头巷尾的大众文化。如此操作之后,就既保证了这些文学的难度和价值,也保证了作为阐释者的教授和批评家的价值。因此,经典争夺战说到底是“文化资本”的争夺战。由此我便想到,当一些学者非常急迫地想让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这件事情绝不可看得过于简单,那应该也是“文化资本”的幽灵在五里一徘徊吧。

菲德勒是位后现代主义者,也是1969年因发表《穿越边界,填平沟壑》而轰动一时的那位作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谈论文学与大众文化果然好玩,比如,他说:在父权时代,文学向母权大献殷勤,恰如在基督教时代,文学在为魔鬼伸张权利。“但凡官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界定为格格不入于文明和人文的东西,此类艺术就大唱赞歌,所以最普遍被禁忌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它最普遍的题材,比方说:吃人的冲动、乱伦、强奸和被强奸的渴望。”因此,《俄狄浦斯王》、《美狄亚》、《亨利四世》和《麦克白》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是因为它们寓教于乐,而且也因为“它们以白日梦的方式,允许我们像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娶母、如麦克白那样谋杀国王、像美狄亚那样残杀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及似福斯塔夫那样,满口谎言、偷窃成性、坑蒙拐骗、乔装改扮逃避一场正义且势在必行的战争,而且还因此名扬天下!”他刚说过“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即是保证博士生能有机会来展示他们的阐释技能”,马上又说“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让我们释放非自然的冲动,包括是不是要从我们头脑中夺路而出的欲求”。这些说法戏谑调侃、风趣幽默,你不必全部当真,但它们至少说出了部分道理。

而在这些说法中,我尤其欣赏他的如下论断:现在的许多作家,起笔要么是写给学院供人阐释,要么是写给好莱坞赢得票房。正是在一意义上,他说小说才真正死了,因为真正的小说是无须转译为另一种媒介和另一种语境的。以往我们谈论“文学终结论”时,使用的资源往往来自于希利斯·米勒。因为从世纪之交开始,他不时会来中国开会,且终因一篇论文引发了“文学是否走向终结”的大讨论。我想,尽管米勒的论述有其道理,但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注意一下菲德勒提到的这种动向,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